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为山有个“九寨沟”

黄金云

到醴陵为山，若只看那国家级文物的古窑，未免稍显遗憾。唯有再探一深山中那处被称为“为山九寨沟”的秘境，这趟旅程才算圆满。

所谓“九寨沟”，实则是山巅的一方平湖。

春雨初歇，微寒尚在，暖风已至。湖畔的群山仿佛一夜醒来，映山红从茅草丛中、荆棘隙里探出头，东一丛西一簇，瞬间点燃了整座山岭。远望望去，那份热烈简直要从枝头溢出来。最妙的是悬崖峭壁间那一株、独踞高处、背倚青黑岩石，晨饮朝露，暮送夕阳。它开得最是肆意明艳，引得游人纷纷驻足，惊叹这不可复制的偶遇。

这株映山红依着脚下的山石，却更似在凝视着眼前的湖水——那是一片令人心醉的蓝。

为山多石灰岩，独特的地质赋予了湖水神奇的魔力。每当烟雨蒙蒙或山溪喧嘩之时，湖水盈满，便化作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沉在山谷。这蓝，深邃而通透，从水底晕染至水面。风静时，它是并不规则的蓝镜，收纳了岸边的嶙峋黑石、山顶的挺拔古树；风起时，波光潋滟，又似一匹硕大的蓝绸在天地间轻轻晃荡。当地老人说，这里原叫仙源冲，传说是何仙姑路过时遗落的一方蓝纱巾，才化作了这般梦幻的色彩。

面对这般迷人的水，谁不生出一份亲近之意？可当你急切地掬水在手，却发现掌心只有清冽，绝无半点蓝色。那抹深邃的蓝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，像极了一个遥远的梦。

终有一日，悬崖上那抹最艳的映山红，似是听懂了春风的鼓动。花瓣一朵接一朵，带着几分羞怯与决绝，轻盈飘落。它们在水面上随风立起，旋转、起舞，宛如身着红装的芭蕾仙子，在画眉与白头翁的婉转啼鸣中，完成了一场与蓝水的沉浸式约会。蓝宝石上红星点点，连山风都似乎屏住了呼吸，不忍打扰这静美一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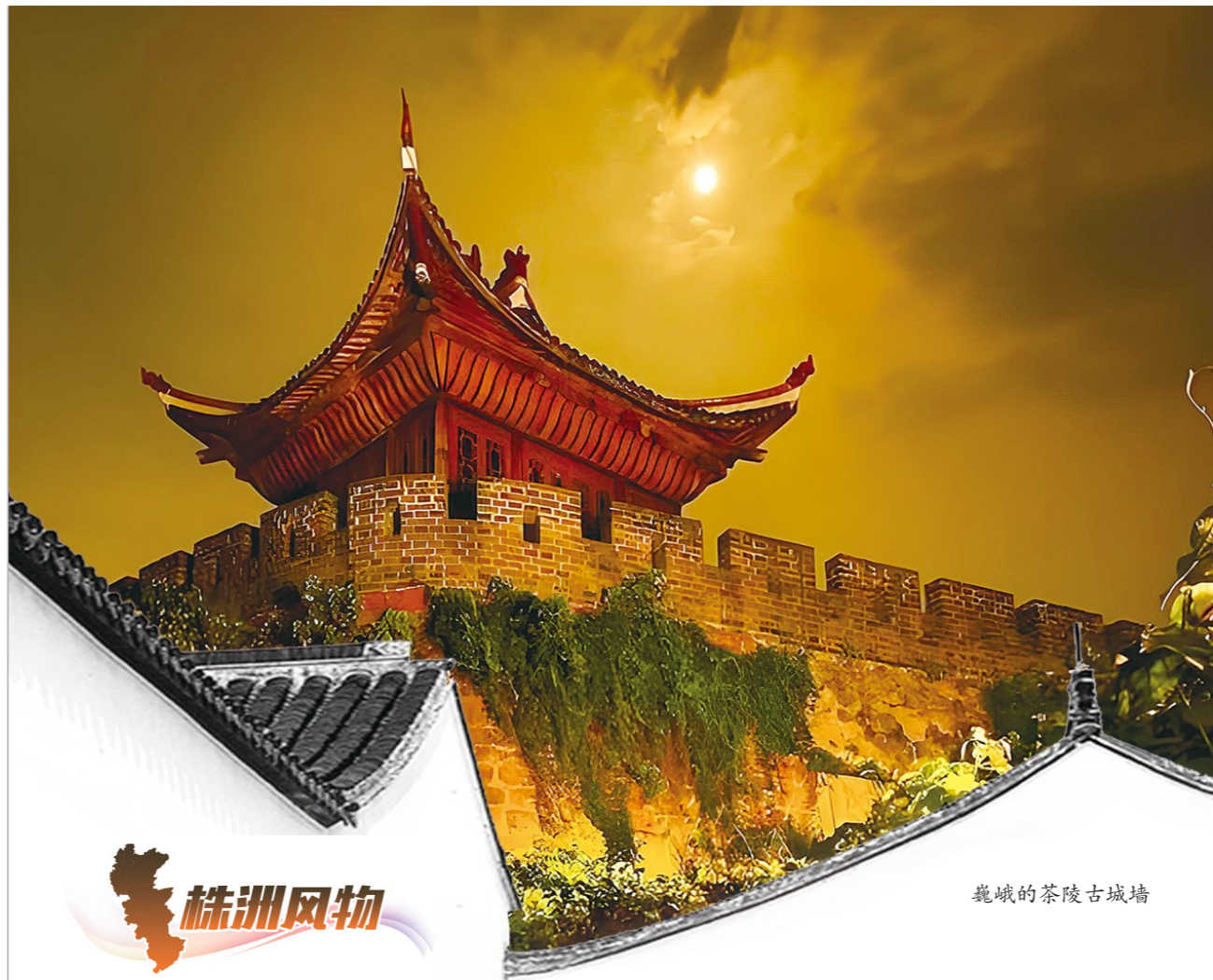
待到山外芳菲散尽，湖畔的野景才刚刚登场。藏在深山，时光似乎慢了半拍。此时，湖边的山桃花——当地人唤作猫桃，才慵懒地爬上枝头，粉嫩细致。这猫桃个头不大，夏至过后，果皮裹上一层灰白茸毛，通体转为暗红，便是熟透了。咬上一口，汁多蜜甜，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。早些年，这片山水鲜为人知，满树猫桃成了鸟雀的盛宴，落果成苗，竟也蔚然成林。

桃林、落花、深潭。若李白云游至此，怕是也要生出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的感慨吧。

这湖水不仅色泽奇异，脾性也古怪。春夏之交水满，盛夏时节却常退去一半。烈日炎炎下，湖面反倒笼罩着层层薄雾，如白纱般曼舞。此时掬水洗脸，清凉宜人，但若探入深处，水温骤降，寒气侵骨，令人不敢久留。

而一入冬，白雾顿消，即便冰凌挂树、大雪封山，湖水却温热异常。世人皆知溶洞冬暖夏凉，未曾想这露天的深湖竟也如此，实乃为山一奇。

真正的九寨沟，有五颜六色的山石，有数不清的游鱼。为山的“九寨沟”没有这些。它只有一种纯粹的蓝，简单、质朴。但也正因没有鱼群的喧闹，才落得这一方大自在的清静。



株洲风物

巍峨的茶陵古城墙

风雨茶陵：一座千年古城的石筑史诗

谭晶玲

在湘东宏阔的山水画卷中，茶陵是一处造物主精心布置的棋眼。洙水自罗霄山脉奔涌而来，北行两百余里贯穿全境，与巍峨的云阳山互为借景，在这片三面环水、一面靠山的天然之地，勾勒出茶陵最初的轮廓。

公元1637年的那个正月，旅行家徐霞客从江西踏雪而来。在《楚游日记》中，他惊叹于云阳山的空灵澄澈，更在这座城市的肌理。但他或许未曾深究，眼前的山川形胜，实则是茶陵历史最宏大的叙事背景——为了在这片多水且多战之地生存，茶陵人穷尽千年智慧，上演了一场从土城到石城的防御史诗。

土垒的序章：从“茶王”到“马王”

茶陵的建置史，是一段在泥土中摸索的早期记忆。

据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记载，早在西汉初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茶陵便已置县。1954年长沙西汉墓出土的“茶陵”（茶为茶的古字）古印，为这个古老的名称提供了确凿的物证。然而，真正让茶陵在历史上留下“筑城”印记的，是汉武帝元朔四年（公元前125年）的一场分封。

那一年，长沙定王之子刘新（一作刘欣）受封为茶陵侯，茶陵县升格为侯国。为了彰显诸侯的威仪并巩固统治，刘新在一个三面环山冲的山冲（今今田镇莲溪村一带），夯土为墙，筑起了一座“茶王城”。

这座土城是茶陵作为政治中心的初啼。虽然侯国因刘新之子刘后而短命，茶王城也最终随着隋灭陈的战火而废弃，但它留给茶陵的遗产却意外地温情。刘新在位时“在国宽慈”，死后被史氏世代追思。即便在千年后的宋朝，他仍被屡次加封为“广利侯”“广利公”“明灵公”“威护公”“仁惠公”“孚佑公”“昭应公”“英惠王”“广泽王”……作为一个封建领主，他或许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仅凭“轻徭薄赋”这一项德政，便在百姓心中筑起了一座比土墙更持久的丰碑。

时光流转至五代十国，天下大乱。茶陵因地处湘赣要冲，再次被推向了战争的前沿。这一次的主角是楚王马殷。这位出身木匠的乱世枭雄，为了保卫富庶的楚国腹地，防御东南吴国的威胁，于后唐长兴年间（约930—933年）派遣他的孙马宏芳屯兵茶陵。他们在高院镇古城村修筑了一座军事堡垒——“马王城”。与温情的茶王城不同，马王城是一座纯粹的战争机器。尽管具体形制已难考证，但从今日残存的烽火台遗迹中，仍能嗅到当年“五马争槽”乱世中的血腥气息。

无论是政治象征的茶王城，还是军事堡垒的马王城，它们都是泥土夯筑的产物。在南方的多雨气候与频繁战火面前，土墙显得脆弱而易朽。茶陵在等待，等待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，等待石头时代的到来。

石头的史诗：刘子迈与那头不朽的铁犀

南宋绍定四年（1231年），茶陵迎来了它的历史转折点。

彼时，湘南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，兵锋直指茶陵。时任湖南安抚使的余曠和茶陵县令兼军使刘子迈审视旧治，深感土城难守。在与死的拷问下，他们做出了一个改写茶陵历史的决定：不再修修补补，而是另择险要，筑一座真正的“金城汤池”。

刘子迈是一位具有卓越工程眼光的实干家。他没有选择简单的夯土技术，而是开启了一场浩大的“石构运动”。工匠们被召集起来，在洙水河畔打下密密麻麻的松木桩，作为深基；随后，开采重达数百斤乃至数千斤的赭红色砂岩条石，以此垒砌城基与护堤。

这不仅仅是一次建筑材料的升级，更是一次防御理念的革命。刘子迈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“军民两用、水陆双防”的复杂系统：在城南，引洙水入新开挖的护城河，让洙水环绕城西与城北，形成“濠为堑，据城而守”的军事闭环；在江岸，以石堤护城，以城墙防洪，形成“以堤护城，以城防洪”的水利闭环。

最令人称绝的一笔，在于那尊镇守江岸的“铁犀”。为了镇压常年泛滥的洙水，刘子迈命工匠铸造了一尊数千斤重的铁犀牛，置于临河城墙之下。这尊铁犀昂首向天，怒目圆睁，既是古人“以犀厌水”的巫术寄托，更是枯水期与丰水期的水位标尺。绍定五年（1232年）工程告竣时，一座周长约五里、高两丈五尺的宏大石城拔地而起。内夯土、外包红石，辅以石灰糯米浆勾缝，坚固如铸。

这座城的诞生，标志着茶陵彻底告别了“因权宜而设”的土城时代，进入了“因永固而建”的石城时代。

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残酷考验。元军南下的铁蹄曾冲击过它，明清更迭的战火曾焚烧过它，但它始终屹立不倒。更多的时候，它是茶陵百姓面对洪水时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每逢汛期，怒涛拍岸，正是这坚固的石堤与那尊定海神针般的铁犀，一次次将天顶之灾拒之门外。

那尊铸造于南宋的铁犀，历经近八百个春秋的风吹雨打，竟无半点锈蚀，至今黝黑光亮如初。它是冶金史上的奇迹，更是刘子迈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物质化身。

关隘的回响：吴头楚尾的兵家必争

茶陵的防御史，不仅写在县城的石墙上，更刻在湘赣边界的群山褶皱里。

在茶陵东界，至今遗存着一道被称为“吴楚雄关”的古老壕沟。这里位于秩堂镇晓塘村与江西莲花交界处，一条宽约30米的壕沟如刀疤般断开群山。2014年，这里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鼎、剑、戈等文物，学者据此推断，此地是楚国控

制罗霄山脉地区、与越文化交流融合的边境重镇，亦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楚国激烈争夺的边界线。自古有“吴头楚尾”之称。邻近的界化壑（高院镇境内），同为该防御体系上的重要孔道，也曾因地处湘赣交通枢纽而商贸云集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“小南京”之称。

茶陵，因地处要冲，注定无法在历史的剧变中独善其身。它是一座被历史不断路过的城市：三国时期，东吴名将吕岱曾在此系马，经营荆南；南宋绍兴年间，岳飞为剿灭流寇曹成，曾在此屯兵筑修“鄂王城”；明代末年，张献忠的起义军几度争夺“吴楚雄关”，将这片土地犁了一遍又一遍……

史家常言：“凡有城墙，必为福地；凡是福地，必遭兵燹。”茶陵的每一寸城墙，都浸透着这种辩证的悲剧感。城墙因守护富庶而建，却又因战略价值而招致战火。生活在城墙内的茶陵先民，他们的命运始终与整个时代的治乱兴衰紧紧捆绑。

然而，正是这些如流星般划过名将与过客，与那些屹立或倒塌的城墙一起，共同铭刻了这片土地坚韧与沧桑并存的记忆年轮。它们证明了，茶陵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，更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南北对峙、文化交融的见证者。

活着的遗产：从防御工事到文化图腾

硝烟散尽，繁华落尽，唯有石头比时间更坚硬。

当年的茶王城、马王城多已湮灭，唯有刘子迈奠基的这座南宋石城，奇迹般地超越了它的建造初衷。它未能完全阻挡住后世所有的兵祸，但其坚固的躯体却成功抵御了无数次洙水洪流，实实在在地庇护了一城生灵。

今天，当我们漫步在洙水之滨，依然能看到现存的1536米古城墙蜿蜒如龙，其中600余米为珍贵的宋代原构。迎薰门（南门）、迎相门（西门）依旧巍然屹立，城墙上长满了藤萝、青苔和芦苇，如同瓦屋檐下静坐的老祖母，写满了沧桑与慈祥。

2013年，茶陵古城墙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是湖南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头城墙，也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的集防御与防洪于一体的宋代县级城址孤本。

在现代的城市肌理中，古城墙不再是冷冰冰的防御工事，而是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。近年来，修缮后的城墙与马道重新融入了茶陵人的生活。老人们在城墙根下晒太阳，孩子们在铁犀旁嬉戏，千年的历史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及。

那些曾为分割与防御而生的砖石，在时光的冲刷下，最终淬炼成了城市的脊梁。如今，当你抚摸那些被风雨侵蚀却依然坚硬的红色条石时，你触摸到的不仅仅是宋代的工艺、明清的修补，更是一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，择善地而居、因势利导、生生不息的生命脉动。

这是一部用石头写就的史诗，它沉默不语，却震耳欲聋。

赫赫皇猷与渺渺诗魂

——一首清代炎帝陵祭祀诗的考辨

段立新

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编纂的《炎陵志》中，辑录了一首题为《恭拟平滇大功告祭炎陵歌》的歌词体诗作。

诗云：“赫赫圣朝，寅承大统。蠢尔九隆，胡歌忘纵。恭行天讨，命将率众。风靡沦澜，威陵教冢。银窠陋唐，玉斧鄙宋。既奏凯歌，爰腾欢颂。祀礼修举，广乐荐用。辉光丰融，彤璽上呈。炎陵昭昭，匠心洞洞。以告皇猷，神祝式重。”

这首诗并非泛泛而谈的应酬之作，它背后伫立着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：康熙王朝平定三藩之乱。然而，当你试图穿透纸背，寻找那位挥毫泼墨的作者时，却发现历史的迷雾重重锁闭，留下了一桩耐人寻味的文化公案。

铁马金戈入诗来

通读这篇《恭拟平滇大功告祭炎陵歌》，但觉气象宏大，笔力雄健，三个乐章层层递进，重现了那个烽火连天又终归大治的时代。

首层意在“扬威”。诗人以“既奏凯歌，爰腾欢颂”为轴，先是痛斥吴三桂之流为“蠢尔九隆”（“九隆”乃云南哀牢山古老传说中的始祖，此处代指盘踞云南的叛军），质问其何敢数典忘祖、放纵妄为。紧接着，笔锋一转，铺陈大清王师“恭行天讨”的雷霆之势。最为精彩者，莫过于“银窠陋唐，玉斧鄙宋”二句——唐朝曾赐南诏“金印银窠”，不仅未能羁縻边陲，反致养虎为患，故曰“陋”；宋太祖赵匡胤曾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，言“此外非吾有也”，主动放弃云南，故曰“鄙”。诗人借古讽今，极力宣扬本朝一统平滇、版图归一的赫赫武功，其自豪感跃然纸上。

次层意在“叙礼”。围绕“告祭炎陵”之题，诗人铺陈了“祀礼修举，广乐荐用”的盛大场面。乐舞齐备，礼仪隆重，香火升腾间，仿佛能见神人交感的庄严气象。

末层意在“祈愿”。“以告皇猷，神祝式重”，直抒胸臆，向始祖炎帝呈报平定三藩的捷报，祈求神灵佑佑国祚绵长。整首诗既是凯歌，亦是颂词，充满了庙堂之高的庄严与肃穆。

康熙朝的“凯旋回响”

诗歌背后的历史节点，定格在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。

这年十月，清军铁骑兵临昆明城下。二十九日，穷途末路的吴世璠自缢身亡，残部开城投降。这场历时八年、波及半个中国的“三藩之乱”终告平息。对于年轻的康熙皇帝而言，这是他执政生涯中至关重要的第一场胜利。

清朝极重礼法，凡国有大庆——或新皇登基、或册立储君、或大军凯旋，必遣官专程赴郡县（今炎陵县）告祭始祖。战火甫熄，硝烟散尽，康熙帝即循惯例，命督理理事官魏双凤为钦差，赴远湖湘。
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农历七月初八，炎帝陵前，旌旗蔽日，雅乐和鸣，一场盛大的“平滇大功”告祭大典隆重举行。而这首《恭拟平滇大功告祭炎陵歌》，正是这场国家级典礼的历史见证。

谁是执笔者？一场跨越百年的探秘

诗文俱佳，史事确凿，但在确认作者时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。

新修的《湖南省特色丛书·炎帝陵志》与道光版《炎陵志》一样，将此诗作者署名为彭维铭。书中注释云：“彭维铭，湖南茶陵人……曾任四川巴州知州。此歌为大典而作。”

乍看之下，言之凿凿。彭维铭乃茶陵名门望族之后，其兄彭维新更是名震朝野的清代大学士。然而，当我们翻开尘封的《石署彭氏族谱》，一个巨大的时间漏洞赫然出现：族谱记载，彭维铭生于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，而魏双凤告祭炎帝是在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。也就是说，大典举行时，彭维铭尚未出生。即便是他那位官至大学士的兄长彭维新，当时也不过是个两岁的孩童。显而易见，彭氏兄弟绝不可能是此诗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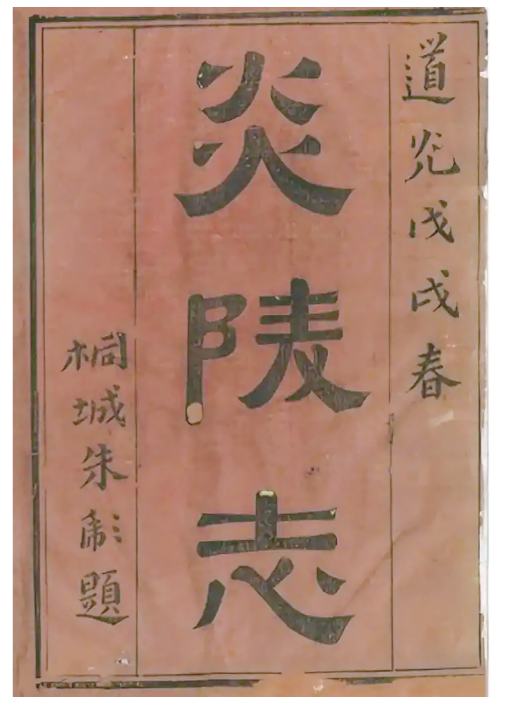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作者会是茶陵彭家的另一位才子——彭世滋吗？道光版《炎陵志》收录了彭世滋的《拟祭神歌》与《小憩奉圣寺偶感》。前者描绘了“音乐奏，拟刑天……龙潭澄，鹿原蔚”的祭祀盛景，后者则记录了他在炎陵奉圣寺“萧然困卧”的秋日感怀。

这两首诗透露出关键信息：彭世滋确实在某年秋天亲历了炎帝陵的祭祀大典，且留下了生动的诗篇。更有趣的是，《平滇歌》的题名为“恭拟”，这往往是文人学士代官拟作或事后追慕之作。

但是，谜题并未完全解开。据同治九年版《茶陵州志》记载，彭世滋乃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甲子科举人。若以此推算，他生活的年代距离1682年的平滇祭祀已逾一个甲子。

综上所述，虽然《平滇歌》被误植于彭维铭名下，但其真实作者依然隐于历史的迷雾中。它极有可能是当时随行官员魏双凤的幕僚所作，抑或是后世文人如彭世滋者，感怀前朝武功，以“恭拟”之名创作的怀古之作。

无论作者是谁，这首诗都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魅力，为我们保留了三百年前那场盛大祭典的珍贵记忆，让后人得以在字里行间，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。



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编纂的《炎陵志》封面